

2012 年 3 月  
第 1 期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March 2012  
No. 1

## 国际移民研究

# 国际移民研究热点与华侨华人研究展望<sup>\*</sup>

李明欢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关键词] 华人研究; 国际移民; 移民理论; 移民政策; 软实力; 侨务政策

[摘 要] 论文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对当今国际学术界国际移民研究的热点进行了评介, 剖析重要概念, 展望发展趋势, 认为国际移民是全球化的一个系统性因素, 唯有将国际移民置于全球化的大系统之内, 方能准确认识其社会影响, 正确评价其未来走向。同时结合国内华侨华人研究现状, 对华侨华人研究总体水平进行了回顾, 并就一些迫切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进行了理性思考。

[中图分类号] D523.8; D63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 (2012) 01-0018-06

## Recent Research Focuses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Current Outlook for China's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LI Ming-huan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migration theory; migration policy; soft power; overseas Chinese policy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flows of products, capital, and information among nation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has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globalization. With this new trend,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 studies have focused their attention on topics such as the appearance of flexible citizenship and its implications, the clout of immigrant interest groups over public policies, deviating practice between the State as an Actor and the State of Law in immigration, roles of the UN and the NGO in the age of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tagonistic economic interests between the countries exporting migrants and the countries at the receiving end, and resurgence of the agitation for forced assimilation at the expense of multiculturalism. On the other hand, for China's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the expectations are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roles assumed by overseas Chinese as a component of China's soft power, to analyze diverse perceptions of identity issues by overseas Chinese living in varied geographic and cultural settings, to ponder over controversies around the official policy of abolishing dual-citizenship,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overflowing

[收稿日期] 2011-11-28; [修回日期] 2012-01-30

[作者简介] 李明欢, 女, 广东汕头人,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博士,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长期从事国际移民与华侨华人研究。

<sup>\*</sup>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1BMZ038) 阶段性成果。

made-in-China products upon the local overseas Chinese economy, and to probe into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promo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Chinese education based o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根据联合国经济与事务委员会提供的统计数据,全球跨国移民总数从1990年的1.54亿上升到2010年的2.14亿,并预计在2050年将达到4.05亿,当今世界已进入“国际移民时代”。<sup>[1]</sup>换言之,随着当今世界商品、资本、信息的大幅度跨境流动,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趋势必然在开拓普通人视野的同时,导致劳动力市场的跨国化,进而促使人口在就业上呈现高度流动性,在生活环境的选择上呈现广泛趋优性,迁移日渐成为现代人生活方式中习以为常的组成部分。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跨越障碍:人口流动与发展》一书中,对全球人口流动大趋势进行了全面分析,明确指出:寻求更佳机会、改善自身生活水准,是当代国际移民的基本追求。鉴于未来数十年世界各地人口构成与经济不平衡还将延续,全球人口流动的压力势必继续加大。<sup>[2]</sup>可以说,时至今日,全世界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完全置身于国际移民潮之外,其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有的是移民迁出国,有的是移民输入国,有的是移民过境国,但在许多情况下,则是三种现象在同一国家内相互交织,比肩并存。有鉴于此,如何实现国际移民有序流动,使原居地和目的地社会共同受益,成为各国关注国际移民之学人密切关注、孜孜探求的热点所在。

在政治学层面上,国际移民研究主要关注的热点包括:随着“弹性公民”现象的出现甚至流行,<sup>[3]</sup>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哪些根本性变化?影响国家对移民控制力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移民作为一个利益群体,可能对以当今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公共政策制定产生什么影响?如何解读一些国家在移民问题上“立法”与“执法”明显背离的现象?<sup>[4]</sup>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包括诸多NGO)应当或可能在国际移民时代发挥什么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墨西哥、印度等拥有大量外国侨民的国家均在不同程度上视本国在外侨民为重要的政治资本。因为,随着他们融入居住国社会程度的深化,他们已经并且还将继续形成富有影响的选民群体,逐步构成一支政治力量,必要时还可能成为外交政策中的压力集团。<sup>[5]</sup>因此,一些发展中国家日益重视如何完善并利用新型的跨国移民网络,而不少试图代表移民利益的非官方组织在政治舞台上也十分活跃,在此大背景下,全世界已有70多个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国民可以持有双重甚至多重国籍,<sup>[6]</sup>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上正被一些国家付诸实施的新国籍理论,将国籍与公民权部分分离,认为国籍是区分公民和外国人的依据,但不是确认公民和外国人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唯一依据。<sup>[7]</sup>国籍法因应时代而出现的这些发展动向,无疑是对全球化时代跨国空间形成、跨国网络拓展、跨国化生存策略泛化的事实性认可与回应,值得关注和进一步探讨。

国际移民学界对于跨国移民之经济影响力的研究重点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有所不同。以劳务外派或移民外迁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多注重如何建构更完善的移民模式,以进一步促使移民者个人及移出地社会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反之,在以接收移民为主的“高收入国家”,其执行的是“掐尖”政策,即利用外国移民生命历程中的“黄金时段”,将未成年阶段的抚养费用及退休之后的养老推给原居国承担,从中获取最高的移民人口红利。<sup>[8]</sup>然而,当外来移民作为廉价劳动力不断填补当地劳动力市场空缺时,其经济上形成的连锁效应可能有三:其一,可能因移民劳动力价格低廉,使本国资本得以获取更高的剩余价值;其二,面对外来移民的就业竞争,本土劳动者也必须接受较低工资;其三,外来移民可能在当地构建异质的“族群经济空间”,以特别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挑战当地相应行业甚至取而代之。因此,发达国家时常面对的难点是如何在资本利润最大化追求与维护本国普通民众既得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以下问题,移入国和移出国都需要认真考量:移民收入的消费地主要在哪里?当劳动力移民主体度过青壮年期后,将在哪里养老?其养老支出由谁承担?移民下一代成长与教育的社会成本由谁承担?

国际移民研究围绕社会文化层面的争论历来针锋相对。人口的跨境流动，将原本由国境疆界阻隔开来的不同文化族群，推进到朝夕相处的同一场域。人口的跨国迁移，必然涉及不同文化的碰撞。20 世纪 70 年代，作为对带有种族歧视标记之“强迫同化论”的反叛，“多元文化”率先在加拿大被纳入应对外来移民的重要国策，随后又相继被瑞典、澳大利亚等多个西方国家正式采纳，且广受赞誉。然而，进入 21 世纪以来，从震惊世界的美国 9·11 事件、2005 年 7·7 伦敦地铁爆炸案到 2005 年 10 月巴黎郊区骚乱等一系列涉及跨国移民的重大事件相继发生，多元文化从学术理念到政策实践都遭遇严峻挑战。极右派势力借反恐行动迅速抬头，在“爱国主义”大纛的庇护下，曾经被万千民众唾弃的极端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得以重新登堂入室，必须对外来移民实施强迫同化或强制排斥的论调，重新回到国际移民政策的话语之中。面对与国际移民相伴而生的文化碰撞与交融，如何既批判“消除差别”的旧种族主义（如“强迫同化论”），又识别并批判在“多元文化”旗号下，以“褒扬差别”为名固化民族差异的“新种族主义”；如何既尊重移民固有文化传统，又有效促进不同族群之间的和谐共处，维护国家统一，实在是国际移民研究的热点问题。

国际移民是全球化的一个系统性因素，唯有将国际移民置于全球化的大系统之内，方能准确认识其社会影响，正确评价其未来走向。全球化决不可能仅仅是经济的全球化，资本、商品、信息的流通必然与观念、文化乃至人的流动并行不悖。全球化正无情地冲击着许多民族国家的核心特色，世界正处于“地域性空间”与“流动性空间”的多方位、多层次互动与碰撞中。<sup>[9]</sup>

中国有着悠久的移民历史。纵观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普通民众为谋生存、求发展而离乡背井，游走迁移，史不绝书。无论是闯关东、走西口，还是下南洋、赴金山；无论是国内著名的徽商、晋商，还是名震南洋的华商、侨领，无不形成于流动迁移之中。数以千万计的海外华侨华人在献身居住国建设发展的同时，也为祖籍国的进步发展立下无可替代的丰功伟绩。无数海外炎黄儿女正是以他们胼手胝足的辛勤奋斗，成为当今联合国所倡导的“移民促进发展，发展提升移民”的样板。<sup>[10]</sup>与此同时，中国侨务工作秉承优良传统，坚持“以人为本，为侨服务”，不断开拓创新，为充分发挥华侨华人的独特作用，推进和谐世界的建设，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已形成了一支有志于华侨华人研究的老中青结合的学术队伍，吸引了众多关心华侨华人研究的有识之士。“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以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为主干，集聚了国内致力于华侨华人研究的学者及侨务第一线的实际工作者，见证了中国特色华侨华人研究事业 30 年的发展历程。学会期刊《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关注的华侨华人研究的重点期刊，功不可没。

展望未来，华侨华人研究事业方兴未艾，还有许多问题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有目共睹，海外华人的总体地位也因此获得一定提升，一些国家对华侨华人与中国之间特殊桥梁作用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有鉴于此，近年来，探讨华侨华人在中国软实力建构和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课题。<sup>[11]</sup>不少学者业已指出，华侨华人在传播中华文化、开展民间外交、宣传中国国情和发展模式等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这与前面提及的以、墨、印等国视本国在外侨民为国家重要政治资本有异曲同工之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毕竟中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国家制度等重要政治层面上，与华侨华人的主要居住国存在明显差异。祖籍国与移居国之间政治制度差异对于华侨华人生存、发展可能存在的影响，仍然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而且，华侨与华人的不同身份对其政治立场有何影响？如何正确认识华侨华人在国家认同、民族意识等方面存在的地区性、国别性乃至个体性差异？如何恰如其分地促进华侨华人成为推动民间外交、增进中外友好的渠道？如何既积极发挥华侨华人的特殊作用，又避免想当然地对软实力元素进行人为的“硬包装”？当“精通”中文的陆克文担任澳大利亚总理，当有着百分之百华裔血统的骆家辉就

任美国驻华大使，当菲律宾两代阿基诺总统先后前来福建寻根问祖，试想，他们的中文技能与华裔血缘认同究竟是哪个国家的“软实力”？又在哪个层面发挥其特殊功能？

近年从中国向外移民虽然仍旧源源不绝，但“海归”潮已经显现。究其原因，首先是中国自身国力大幅度提高形成吸引海外华人回归的拉力；其次亦包含回归者自身追求利益相对更大化的理性选择。目前的回归者有多种类型：抓住中国机遇回国创业、发展；以国外积蓄回国居住享受；未成年人被父母送回国由祖辈抚养；老年人落叶归根返回养老；留学生完成学业或中断学业回归；无证移民自愿或被动返回；等等。在前几类人中，好些人虽然长期生活、工作在中国（有些并保留或重新申请获得了中国的“居民身份证”），却依然持有外国国籍或绿卡（长期居留权）。同时，亦出现一些已经入籍居住国的移民家庭想方设法使某一家庭成员重新恢复或获取中国国籍，实现“一家两（多）国籍”状态。如此种种都是事实上的“双重国籍”，当事人的目的不外同时享受两国对本国国民的优惠待遇。以欧洲为例，外国移民只要持有移入国的长期居留，就可以自由出入国境，如果遵守相关国家的纳税义务，一般不影响其长期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因此，如果能够同时再获得中国的国籍，那么，对移民个人及家庭都是“双赢”。中国政府在原则上不承认双重国籍，但目前有部分海外华人中存在的“事实上的双重国籍”，或曰一人同时兼有“华侨”与“归侨”身份的现象，应当如何应对？长此以往，对我国的国籍法规、侨务政策、国民权益保障乃至中外关系可能产生什么影响？目前我国引进人才的各种计划主要集中于科技人才，但是，如果外籍人才进而要担任社会公职，尤其是一定级别的领导职务，那么，该欢迎还是该限制？目前在一些地区实行的由华侨华人担任“村官”的政策，<sup>[12]</sup>一些地区邀请外籍华人担任人大、政协特邀代表或特邀委员的举措，是否预示外籍华人也可以参与中国政治？近年来部分海外华侨华人一再提出承认双重国籍诉求，在一定程度上是前述全球化时代国际移民群体跨国化生存动态的折射，是“弹性公民”理论的实务化，其趋势是否值得关注与探讨？

各级领导的讲话及我们的诸多研究都强调海外华人应当融入主流社会。然而，当我们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时，是否还应当注意到华侨华人社会内部的多元分化？其一，当下关于“融入”的诸多讨论，基本以美、澳、欧侨情为大背景，因为，新、马、泰等东南亚国家华人族群作为当地国历史发展的主人，本身就是“主流”的有机成分，笔者在马来西亚调研时就听到当地华人对“融入”之说颇为反感；反之，在非洲、拉美，中国新移民主体初来乍到，多数人尚未进入“定居”阶段，更遑论“融入”？其二，即便仅就欧、美、澳的新移民群体而言，历经30年迁移变迁其阶层分化也已十分明显。在他们当中，有腰缠万贯的富豪，有优秀的专业人士，有无数中产小康家庭，亦有数量可观仍为温饱而辛苦劳作的贫困群体。因此，“融入”对不同阶层是否具有不同意义？或曰，不同阶层的融入是否也呈现出分层化趋势？<sup>[13]</sup>

经济上，涌向世界各地的“中国制造”对华侨华人经济影响业已凸显。对此，正反意见均十分尖锐：赞美者认为提高了华人的整体经济水准（如欧洲、非洲华人经济），批评者指责压垮了华人中小企业（如东南亚）。对此，能否拿出令人信服的数据，论证究竟有多少华商、哪些行业因“中国竞争”而“消亡”？又有多少因获益而“崛起”？更重要的是，走向世界的中国制造，在哪些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取代了本地生产者？中国产品与亚、非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相似性指数几何？当我们看到侨商大市场在众多国家兴旺繁荣，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可观效益而欢欣鼓舞时，是否还应结合“族群经济空间”形成及功能、影响之悖论进行解读？<sup>[14]</sup>是否应注意到当族群经济竞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有可能为当地社会所难容，甚至出现威胁？这种威胁可能来自冠冕堂皇的打击“灰色经济运作”，也可能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清扫行动，还可能是某些民族极端分子的恣意妄为。当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互矛盾时，侨务政策的基本取向应当如何？

经济领域的探讨，还需要关注到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伴随着东南亚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形成了一批华人大企业集团，并成为当地民族经济中具有特定族裔特色的组成部分。他

们取代过去对中华故土怀有深厚情感的华人中小企业家，当仁不让地成为华人社会的代表，然而，他们与当地包括华人中产阶级在内的普通华人民众之间有没有共同利益？或，共益何在？矛盾何在？又如，可以看到，他们对中国的崛起与发展表现出基于民族情感的兴奋与期待，然而，是否还有因不敌中国强劲实力竞争并亲历自身经济利益受损而感到的失望与痛心？跨越国界的血缘情感与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孰轻孰重？他们带有明显族裔符号的经济资本，能否成功地转化为社会资本并得到当地社会的认可与肯定？

在文化层面上，目前我国正以国家力量全面拓展汉语国际推广活动，并将其作为强国战略，有舆论提出：没有汉语的国际化，就没有中华文化、中国价值观、中国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的广泛传播与深度认同，就没有中国的真正崛起。然而，外国人懂汉语或学过汉语，是否就意味着懂中华文化？是否就会认同中国的价值观发展理念并成为中国的“友好力量”？

有学者指出，在世界上学汉语的 3000 万人当中，约有 70% 是华人华裔。<sup>[15]</sup>那么，主要由华侨华人为薪火相传而自力更生传承的华文教育，与当下获得国家大力支持的对外汉语推广是什么关系？二者有何区别？又有何联系？汉语国际推广是否应当将海外华人族群文化现状考虑在内？海外华人，特别是在当地有悠久历史的东南亚华人构建自己族群文化的努力与成果，与我们国家话语中的“传播中华文化”之间有何异同？当我们国家作为中华文化的母体正遭遇道德滑坡而令人痛心疾首时，对外汉语所传播的，除了中华语言文字的内在规律及运用之外，还有什么？

窃以为值得探讨问题还有许多。提升华侨华人研究的总体水平，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待与职责。侨史学会近期设立的课题研究资助，获得学人们的普遍好评。在未来一定时期内，想必还能够有指导性地提出一些需要集中攻关的重大课题，汇集各方力量，通过扎扎实实的深入调研，以准确的描述，详实的数据，深刻的剖析，拿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提出能够切实应对实际问题的对策，促进国内华侨华人研究迈上新台阶。

最后，谨引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 2011 年 12 月 18 日“国际移民日”致辞中发出的呼吁作为本文之结尾“让我们采取建设性的举措，使国际移民这一全球性现象成为撬动进步的有力杠杆！”<sup>[16]</sup>

#### [注释]

- [1] 联合国经济与事务委员会人口司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根据其所建立的全球人口数据库提出：2010 年全世界跨国移民人口总数总计为 213,943,812 人。笔者以为，国际移民总量难以精确到个位数，但其大致总量，即 2.14 亿则应当是比较可取的。详见联合国“移民数据库”：<http://esa.un.org/migration/index.asp?panel=1>。
- [2] 详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2009 年人类发展报告”：《跨越障碍：人口流动与发展》(Overcoming barriers: human mobility and development)，NY: UNDP, 2009 年。
- [3] “弹性公民” (Flexible citizenship) 系由美国华裔学者王爱华 (Aihwa Ong) 教授首先提出。一般认为，这是一个“世界公民”群体，主要包括那些腰缠万贯的资本富豪、企业高管或专业精英，他们以全球为其运作平台，因为拥有特殊经济资本或技术资本而受到各国当权者欢迎，口袋里可能同时有好几国护照，可以自由地游走于全球各地。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约有超过 5000 万多国籍人士。参阅 Aihwa Ong,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4] 美、法、英等西方国家的移民法实际上一直存在着“国家立法” (State of Law) 与“国家执法” (State as an Actor) 二者相互背离的矛盾。国家制订种种法律法规，严格规范接纳外国移民的原则及程序。但是，由于国家行政权在不同党派之间相继交接，由不同党派组建的政府在执法时往往出于集团利益而各行其是，朝令夕改，西方国家围绕国际移民的诸多问题不少根源于此。笔者在拙著《国际移民政策研究》第三章对此有较为详尽的论述 (李明欢《国际移民政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 年)。
- [5] 例如，美国近年来的移民政策改革中，因为以墨西哥移民为主的拉美裔族群力量增长迅速，成为自由主义移民政策支持者着重争取的对象。在法国，如何争取来自北非的穆斯林移民的支持，是法国各派政治势力

在争取选票时都必须小心制定的策略。在德国,面对 400 万来自土耳其的移民及其后裔,德国各利益集团在制定政策或组织行动时也必须顾及土耳其族裔的心理感受及可能形成的连锁反应。

- [ 6 ] 美国移民研究中心 ( The US Center for Immigration Studies ) 在 2000 年 7 月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罗列了全世界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双重 ( 多重 ) 国籍的国家共 89 个 ( [http://sgwiki.com/wiki/Dual\\_citizenship](http://sgwiki.com/wiki/Dual_citizenship) )。依笔者分析,这些国家对多重国籍的认可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鼓励法”( Multiple citizenship encouraged ),如澳大利亚、瑞士等国,明确在国籍法中规定本国国民可以拥有双重或多重国籍。第二类是“默认法”,如美国等国的国籍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国民可以拥有多重国籍,但规定:国家无权因其国民加入其他国家国籍而剥夺其国民的原国籍,因此等于默认国民可以拥有多重国籍。《阿拉伯国家人权宪章》第 24 条也规定“不得剥夺任何人的原始国籍。没有法定的有效原因,不得否定任何人取得另一国籍的权利。”第三类是“对等法”,即主权国按照对等原则,与不同国家对应承认双重国籍。如印度规定:只要不是生活在与印度关系紧张的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或孟加拉国的印度海外侨民,均可申请印度的“海外公民证”。
- [ 7 ] 参阅刘国福《华侨华人国籍法律问题新论》,《东南亚研究》2010 年第 4 期。
- [ 8 ] 英国牛津大学移民中心研究员项颀博士的《全球猎身》( *Global “Body Shopping”: An Indian Labor System i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以印度 IT 业跨国移民为例,剖析这一特殊的劳动力群体价值如何在全球化体系内被创造、被利用、被增值,进而指出:跨国化猎身操作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构建了新的跨界流动纽带,还在于它体现了创造财富的新战略、转移价值的新途径以及全球社会不平等的新模式。参阅李明欢《猎头与猎身》,《读书》2011 年第 3 期。
- [ 9 ] 曼纽尔·卡斯特 ( Manuel Castells ) 在 1989 年出版的《信息化城市》( *The Informational C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Urban Regional Process*, Oxford, UK;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89 ) 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流动性空间 ( space of flows ) 的概念。随后,他又在《网络社会的崛起》(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1996 ) 一书中对当今世界“地域性空间”( a space of places ) 与“流动性空间”的互动与碰撞进行了详尽论述。虽然曼纽尔主要论述的是信息意义上的空间观念,但不少国际移民学界学者从移民的流动性视角认同、或借用了曼纽尔的这一概念 ( 参阅: Stephen Castles, “The factors that make and unmake migration polici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04 年第 3 期 )。
- [ 10 ]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我联合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美好的世界”为口号的联合国组织,已经将“国际移民与发展”提上了联合国的议事日程,并不断凸显其特殊意义与重要性。由联合国提议并协调,已经召开了一系列重要的全球性政府级会议,力图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国际移民与社会发展相得益彰的美好愿望。参阅李明欢《国际移民与发展:相互依存三方共赢》,《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 年第 3 期。
- [ 11 ] 目前已有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等学术机构组织的专门团队在进行“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重大课题的研究。
- [ 12 ] 2008 年浙江村级民主换届选举结束后,在浙南侨乡地区共有 36 名华侨当选为村官。当地政府制定了灵活政策,为这些在国外居住五年以上、已经失去原居地户籍的回归侨民重新落户口、重办身份证。国内相关报章对此有不少报道。参阅夏凤珍《“华侨村官”与侨乡新农村建设》,《农村经济》2010 年第 7 期。
- [ 13 ] 美国周敏教授在对美国越南移民族群第二代进行研究时,运用并发展了“多向分层同化理论”( segmented assimilation theory ),值得借鉴 ( 参阅周敏《美国华人社会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2006 年 )。
- [ 14 ] 国际移民学界著名学者波特斯 ( Alejandro Portes ) 等人曾提出“三重劳动力市场理论”:上层市场提供的是高收益、高保障、环境舒适的工作,而下层市场则相反,此外,还有一个在移民族群自身发展基础上形成的特殊“族群市场”,通过移民纽带不断引入新移民作为廉价劳动力而增强产品的竞争力。参阅李明欢《20 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厦门大学学报》2000 年第 4 期。
- [ 15 ] 贾益民《海外华文教学的若干问题》,《语言文字应用》2007 年第 3 期。
- [ 16 ] 联合国秘书长 2011 年 12 月 18 日“国际移民日”致词, <http://www.un.org/esa/population/migration/2011migrantsday-sge.pdf>。